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发展

倪世雄

不久前,我应美中国际关系研究交流委员会(CIRSPRC)的邀请赴美国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研究和讲学,先后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乔治城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斯坦福大学等20多所大学以及若干研究所,会见了100多名同行学者,对战后到70年代末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考察。

毋庸置疑,近年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发展是引人注目的,但由于篇幅关系,在这只能作一粗略的介绍。

一、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是近10年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的最有影响的理论思潮。美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1979年)是新现实主义出现的标志。1986年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则对围绕新现实主义问题的争鸣意见作了及时的理论归纳和总结。目前,美国学者较一致的看法是,新现实主义是在新形势下对早期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修正”和“补救”。霍夫曼等学者特别指出了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三方面区别:

(1) 现实主义着眼于国家,强调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新现实主义着眼于体系,认为世界包含着国际政治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

(2) 现实主义着重研究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新现实主义则着重研究全球国家间的权力分配,主张结构分析。

(3) 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冲突;新现实主义则强调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的结合。

理查德·法恩伯格则归纳了新现实主义的六方面特征^①:

(1) 新现实主义在承认体系作用的同时,认为民族国家仍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组织单位;

(2) 新现实主义认为,各国政府对私人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和银行的控制越发困难;

(3) 新现实主义比现实主义更注重国际经济关系因素;

(4) 现实主义较多地注重欧洲事务,新现实主义更注重第三世界问题;

(5) 新现实主义反对用全球遏制战略来追求美国利益,主张通过加强合作和结盟的途径来实现;

(6) 新现实主义主张限制对外政策中思想意识的作用,认为对外政策应以理性和实用为准则,对外政策是加强政治经济联系的窗口,而不是反映意识形态的镜子。

若将法恩伯格的分析和霍夫曼的分析比较一下,可看出两者不尽相同,这说明,目前美国学者在新现实主义问题上还没有取得共识。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IPE)。自80年代初以来,IPE在美国发展得异常迅猛,就象美国学术界在40、50年代言必称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在60、70年代言必称世界体系和相互依存一样,如今则言必称国际政治经济学。这几年不仅出现了不少关于IPE的专著,而且大

^①引自斯坦利·霍夫曼与笔者谈话内容,1988年10月19日。

^①理查德·法恩伯格:《激烈的地区:第三世界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挑战》,第23—25页。

学已普遍开设了IPE课程，IPE的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这次我在纽约、华盛顿、西雅图、旧金山、圣地亚哥等地就曾与不少IPE学者和教授作过较为深入的交谈，收获匪浅。

从有关学者和教授向我介绍的情况来看，IPE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新思潮，具有以下4个特点：

(1) IPE更为以经济取向，注重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结合，即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与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哥伦比亚大学的理查德·纳尔森甚至提及，IPE显示出“单行道”的趋势，就是说，国际政治学吸收经济学的原理，而不是经济学吸收国际政治的原理。IPE学者试图通过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结合形成一个新学派，以促进社会科学领域中这一交叉学科的发展。

(2) IPE更为以国内政治取向。IPE学者有的是从国际机制研究转向国内机制研究，有的是从国际体系研究转向国家层次研究，这样就形成国内政治取向的特点。

(3) IPE更加注重比较研究，如IPE与相互依存论的比较，与国际机制论的比较，以及与世界秩序论的比较等。

(4) IPE在研究内容上更具体细致，特别是关于这两方面的研究：国际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及其结果，国内因素如何影响一国的对外政策。具体的研究内容涉及面越来越广，包括霸权稳定、霸权后合作、理性选择、长波规律、相互依存、国际机制、依附论、政策分析、微观管理、国家经济手段、新结构分析等等。

以上特点和内容在IPE的代表著作里均可找到。美国学术界目前公认的代表作有6本，按出版年份的顺序排列是：约翰·拉吉的《相互依存的自相矛盾》(1983年)、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的纷争与合作》(1984年)、戴维·鲍德温的《国家的经济手段》(1985年)、斯蒂芬·克拉斯诺的《结构冲突》(1985年)、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的《贸易国的兴起》(1986年)和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87年)。这些书已成了国际关系理论中IPE的必读书，影响渐隆。

在这次访问中，不少美国学者对我说，为了发展国际关系，培养新一代IPE学者的任务十分迫切，十分重要。美国目前一代有影响的IPE学者，不是从政治学转向经济学(如吉尔平、基欧汉、鲍德温等)，就是从经济学转向政治学(如纳尔森、库珀等)，都存在差距和缺陷。今后的新一代IPE学者将既懂政治学又懂经济学，“在他们头脑里两者兼有之。”

(They have both in their heads)这一进程在美国业已开始。这使我联想起我国建立无产阶级国际关系理论的重任，要实现这一重任，关键之一是培养我们自己的掌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熟知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有关学科的新一代理论学者。这是当务之急，又是百年大计。在这方面，我们不仅应该而且能够比西方学者做得更好。

三、合作理论。各种有关合作的理论的出现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近年来发展的又一特色。较有影响的合作理论有：

(1) **霸权稳定理论。**最早由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提出，当时他称之为“领导权稳定理论”，以后才改为“霸权稳定理论”。根据基欧汉的解释，“霸权”意指“能完全控制原料、资本、市场、竞争手段”以及具有世界性的政治影响和军事优势。该理论的核心是认为霸权有利于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其要害是强调一国霸权(即美国霸权)是实现一个开放的自由的世界经济和一个和平的稳定的国际社会的必要条件。难怪乎该派学者对美国霸业衰败的现状感到忧心忡忡，一筹莫展。

(2) 霸权后合作理论。这是与霸权稳定理论密切相关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新动向。罗伯特·基欧汉等学者看到了美国霸权日落西山的不可逆转性,认为摆脱困境的关键是在不存在一国霸权的情况下组织好合作,即霸权后合作。与霸权稳定论相比,霸权后合作理论与美国霸权的衰落更有关系。然而,两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对昔日美国霸权丧失的惋惜和对现实理论的战略修正。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里提出,在一国霸权不复存在的条件下国际关系主要采取3种形式:和谐、合作和争斗,而合作将成为主要形式。合作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利益冲突,而是通过政策调整来积极处理冲突,实现合作。这里的要害仍然是,政策调整要以美国或两个超级大国为主,解决冲突要有利于美国的战略利益。

(3) 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理论。霸权后合作理论已在美国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世界政治》杂志曾出专辑讨论这一问题。撰稿者认为,霸权后合作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战后国际关系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世界范围的无政府状态的实质仍未改变。当然说世界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国家间完全缺乏协调机制,而是说目前的机制过于松散。该派认为,要改变机制松散的情况,必须抓住3个环节:利益一致性、预测共同性和角色关联性。只有这3个环节环环入扣,初见成效,才有望实现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

在谈到合作理论时,霍夫曼和杰维斯都特别地提及两点:一是它对现实主义权力论的修正。现实主义强调争夺权力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冲突是其主要形式。而合作理论则强调健全国际机制,协调冲突,使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形式,与现实主义的冲突理论迥然不同。二是它与博弈论、国际机制论关系密切。在用博弈原理研究合作时,所用的不再是60年代的纯数理博弈模式,而转向统计模式,对先前纯数理模式抱批判态度。两位著名学者对1984年出版的《合作的演变》(罗伯特·埃克塞劳德著)评价甚高,并认为今后5、6年内将会有一批关于合作理论的研究成果问世。

四、国际机制论。“国际机制”目前在美国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国际机制意指“在特定问题领域里组织协调国际关系的原则、准则和决策程序”^①,其针对性是国际社会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国际机制的作用就是可以提供实现秩序的基本条件,以有序代替无序。用霍夫曼的话来说,国际机制不仅讲合作,而且讲如何实现合作、巩固国际体系,因此比合作理论深入了一步。“国际机制”1970年始用于政治经济分析,1975年约翰·拉吉率先用之于国际组织分析。美国学者一般都认为,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斯蒂芬·克拉斯诺主编的《国际机制》(1983年),该书被视为集7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之大成。在分析3派(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否定派)的基础上,克拉斯诺提出了国际机制的3个基本特征:

- (1) 改变国际利益的狭隘观念,主张以合作互利的长远利益代替争夺权力的眼前利益;
- (2) 国际机制并不意味主权的转移或放弃,而只强调各国的共同责任和采取一致行动;
- (3) 国际机制为国际关系角色同时提供机遇和限制。

近10年来,国际机制的研究对象经历了4次转移:从最初的国家对外目标的扩大到相互依赖的发展,然后是从非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行为角色的增多到国际合作形式的变化。研究范围亦从经济、政治发展到国际体系和军事安全。不少学者指出,国际机制应用于军事安全领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国际机制基本上是理想主义的理论模式,虽还不

(下转第79页)

^① 斯蒂芬·克拉斯诺:《国际机制》,第2页。

政府。作为圆桌会议的两主席之一，他“感到道义上和政治上有责任保障波兰人达成的协议”。“对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和政治改革，新政府应全力以赴”。议会选举的当天，基什查克在议会走廊里向蜂拥而至的记者们说：“国内形势是严重的，但也不能投降啊。你们可以相信，对洗衣娘们的通病我是不能忍受的。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一辈子洗脏衣的洗衣娘们不会想象到也可能有干净衣服。尽管我在情报和反间谍部门以及内务部门工作过，但我认为，生活不都是由阴暗面组成的。我相信人们。”波兰统一工人党议员团主席奥热霍夫斯基在介绍基什查克的情况时强调，鉴于目前悲剧性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政治紧张状况，未来的部长会议主席和内阁不仅要善于同国会中各派政治力量达成妥协，同时也必须表现出行动的坚定性和一贯性。而基什查克将军恰好具备这些条件。

基什查克在发表施政演说时强调，波兰既需要民主，又需要纪律，只有全民团结一致才能把波兰建设富强。他说，在经济方面，他不是内行，但愿为波兰优秀的经济专家们发挥才能和作用，斩棘铺路创造条件。他还提出新政府将在经济方面做三件事：

第一，最近几个月内将千方百计地增加

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缩短基建战线，调整出口结构，减少开支，包括减少一些社会拨款，控制货币大量投入和采取其他的应急措施，以制止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第二，最近一年半至二年时间内将实施中期行动方案，其中心内容为加速经济市场化和食品自给的进程。

第三，为实现经济上的战略目标——建立经济新秩序而采取行动。它包括对各经济成分一视同仁，实行商品——货币经济。

基什查克被议会任命为波兰部长会议主席后，极力同各方磋商，争取组成广泛的联合政府，但因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从中作梗，并拉拢统一农民党和统一民主党反对基什查克组阁。在这种情况下，基什查克为了顾全大局，主动向议会提出辞职。至此，16天部长会议主席的短暂使命结束了。

64岁的基什查克长着一头稠密的黑发，身体健壮。他平时喜欢着便装，同反对派谈判期间更是如此。

他的家庭幸福美满，其妻是一位波兰经济学家。儿子在军队服役，女儿随其丈夫一起在伦敦的波兰代表机构工作。基什查克喜欢跑步、滑雪、骑马、狩猎、旅游、登山和打桥牌。

(1989年9月稿)

〔责任编辑 谭秀英〕

(上接第57页) 是现实，但对今后世界秩序的调整和加强的意义不可低估。目前，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正围绕国际机制的定义、形式、维持、变化4大课题进行着深入探讨。

此外，杰维斯等在用心理学方法深入研究冲突和威慑战略，以及霍夫曼和约瑟夫·奈等在对核时代伦理学的研究方面在过去几年也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总之，这10年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领域虽没有大的理论突破，但仍呈现十分活跃的局面。学者们强调国际关系理论要反映核时代现实，服务于美国战略决策；要注重各派兼收并蓄，相互溶合。学者们还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正处于一个产生新的理论体系之前的过渡阶段。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这一动向，我们应用科学的、分析的 and 批评的态度予以考察和研究。(1989年10月稿)

〔责任编辑 李刚〕